

第三辑

邱高兴 主编



江浙文化

上海三联书店

第三辑

邱高兴 主编



江浙文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浙文化. 第三辑/邱高兴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12

ISBN 978-7-5426-6083-1

I. ①江… II. ①邱…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研究—江苏
②地方文化—文化研究—浙江 IV. ①G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8854 号

江浙文化(第三辑)

主 编 / 邱高兴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20 千字

印 张 / 18.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83-1/G·1469

定 价 / 5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作者简介

- 郑开 男,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张丰乾 男,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 杨维中 男,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粮荻 女,博士,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 张凯 男,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
- 韩朝忠 男,博士,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 刘辉 女,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金大伟 男,博士,中国计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 杜萍萍 女,博士,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王江武 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蔚然 女,博士,中国计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曹继华 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 张云鹏 男,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 胡艺珊 女,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 徐冰 男,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讲师。
- 房瑞丽 女,博士,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王梅红 女,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 王国雨 男,博士,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 李宇环 女,博士,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 伏志强 男,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施淑静 女,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 阎晓真 女,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15 级硕士研究生。
- 王正航 男,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15 级硕士研究生。
- 陈泓伊 女,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14 级硕士研究生。

高 璐 男,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15 级硕士研究生。

肖玲玲 女,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14 级硕士研究生。

张 亮 男,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黄勋杰 男,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16 级硕士研究生。

范天宁 男,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13 级学生。

本辑特稿

“旧邦”何以能够“新命”？

——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之内生动力与人文动机····· 郑 开 3

儒佛新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价值观的体与用····· 张丰乾 19

佛教人生观与命运观论略····· 杨维中 39

汉传佛教海洋观之圆融意蕴····· 稂 荻 李 娜 50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从东亚佛教的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张 凯 59

常惺法师人间佛教实践研究····· 韩朝忠 68

“道胜”——中国传统兵家的价值理想····· 刘 辉 74

从春秋战事看传统价值观的转变····· 金大伟 80

佛教缘起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 杜萍萍 95

康有为对儒家仁爱之道的重建····· 王江武 107

董其昌禅学思想探析····· 蔚 然 119

他山之石

- 哲学视阈下的“欲”——基于本体概念的重新观照····· 曹继华 133
- 虚实之间：大地与世界的争执
- “虚实相生”艺术原则的现象学考察····· 张云鹏 胡艺珊 143
- 舍勒情感现象学与孟子性善论“以情显性”的必然性····· 徐 冰 150
- 《韩诗外传》生成论略····· 房瑞丽 162
- 中医和谐观念与中国当代医患和谐
- 构建····· 王梅红 裘 梧 魏 鹤 172
- 如何诵读《关雎》?
- 从《周南·关雎》的主旨谈如何理解文化经典····· 王国雨 179
- 觉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路径····· 李宇环 188
- 大学生自我评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伏志强 197
- 浙江高雅艺术消费现状与对策研究
- 以高雅音乐演出市场为例····· 施淑静 204

研究新生

- 帝王立身治国之学问——论宋、明的“帝王之学”····· 阎晓真 215
- 圣学式微下的圣人观——以魏晋郭象为例····· 王正航 221
- 陆九渊“读书——践履”工夫探究····· 陈泓伊 227
- 陈焕章的孔教思想研究——以《孔教论》为例····· 高 璐 234
- 从《爱弥儿》看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 肖玲玲 241
- 禅宗的智慧对独立学院思政教育者的启示····· 张 亮 248
- 曲阜青少年国学教育的现状
- 以“儒源”传统文化学校为例····· 黄勋杰 255
- 面向基础教育 培养儿童国学兴趣
- 杭州市儿童国学教育现状分析····· 范天宁 王连冬 266

本辑特稿

“旧邦”何以能够“新命”？

——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之内生动力与人文动机

郑 开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内容摘要：中国文化既古老又充满生机活力。拙文试图探讨其中内源性动力机制和思想精神层面的基础资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轴心时期形成的经典传统、绵延不绝的政治理念及其精神气质、族群共同体所依赖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反本开新与旧邦新命的思想史意义等问题展开分析讨论，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创造力。

关键词：中国文化 旧邦新命 文化认同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世界诸古代文明几乎都衰颓甚至陨落了，曾经辉煌的古老文化要么逝入了过去的无边黑暗，要么只是弥留于天际的一抹残阳。然而，中国却似乎是一个例外！古代中国文明领先世界长达两千余年，又在经历了近代以来近两百年的曲折屈辱的血泪史之后，现在的中国却与日常新，呈现出了不可阻遏的民族崛起趋势，以及恢弘壮阔的文化复兴前景。这是不是世界文化史上仅见的孤例？中国文化历尽劫难的曲折命运、百折不回的生机活力似乎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并试图理解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将“新命”寓于“旧邦”或者“旧命”何以能够“新命”的原因，探讨中国文化既古老又年轻、既内蕴于历史又显示出活力的动力；特别是当以欧美为代表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已隐约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征兆之时，省思中国文化的独特路径和普遍价值，以及

其与日常新内在动因,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应该说,有了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纵深(它是对古代历史的突破)和现代性建构的视野,可以推动我们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深入分析探讨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独特规律。我们这里试图从思想史角度分析探讨早期(确切地说就是西周春秋时期)文化史上的精神遗产之于中国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毕竟“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当科林伍德这样说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探求历史表象背后的人文动机,而历史之不同于自然过程正在于历史发展受到了人文动机的支配或左右。我们尝试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与内在动力,具体地说就是肇源于殷周之际文化转折所形成的悠远精神传统,进而探讨更广泛、更普遍的文化命运问题。

一、轴心时代与经典传统

雅斯贝斯曾提出“轴心时期”概念审视世界历史,并说明历史与现实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轴心时期”概念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尤为重要。

纵观长时段的历史,中国思想文化世界中特别重要的“思想传统”和“精神气质”肇源于殷周之际,进一步突破于春秋战国之交,奠基于秦汉之世。换言之,早期中国思想文化之遗产,可谓中国文化的历史源泉和精神基础,是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思想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种“思想传统”与“精神气质”出现于殷周之际且进一步突破于春秋战国时期,并最终成熟于秦汉之世,它的发展经历了三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

第一条历史分界线是殷周之际。诚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予以了深刻阐明那样,它不仅仅意味着“小邦周”代替“大邦殷”的政治意义上的革命,也意味着早期国家形成和思想文化的革命性转折,西周以来的“制礼作乐”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史的重要开端,也是思想史的重要起点(经典化已然启动),同时也是文化史上的黎明期。

第二条历史分界线是春秋、战国之交。春秋末年、战国初期也出现了一场极

其深刻的政治社会结构性变动,可以说是“旧制度”遇到了“大革命”,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制度风俗失序),庄子称之为“古之道术为天下裂”(学术思想紊乱);同时政治社会层面的失序也酝酿了精神思想领域内新的发展契机,直接触发了诸子百家蜂起,引发了思想史上惊人跃进——“哲学突破”,这不仅是经典化的新时代,也酝酿产生了新的经典传统

第三条历史分界线是秦汉之世。它的标志是废墟上重建了政治文化诸层面空前一统的王朝。汉承秦制而后的“百代皆沿秦制度”,表明了秦汉国家社会形态是历千年而不废,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基础。同时,语言文字上的统一,文化思想上的融合与整合,经典化过程的最终完成,又奠定了思想传统与精神气质的基本格局。

这三条历史分界线之间正是雅斯贝斯所称的“轴心时期”,它们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极为深刻:一方面,它们标明了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深刻转型;另一方面,它们又将早期历史划分为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一个是殷周之际到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前轴心时期”,一个是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到秦汉时期的“轴心时期”。我们之所以启用了“前轴心时期”和“轴心时期”概念刻画“早期”历史进程,是因为(正如提出轴心时期概念的雅斯贝斯所指出的那样)它影响了整个古代乃至近、现代历史运动的轨迹。同时,我们还认为,中国早期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开展呈现出某种具有很强连续性的特点,因为从“前轴心时期”到“轴心时期”的发展,无论是文化整体还是思想传统,都具有显著的绵延不绝同时又与日常新的特点:绵延不绝是指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而不同于西方历史过程中习以为常的断裂式发展;与日常新意味着创新与转折,特别是思想方面的创造性转化。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前轴心时期”的思想主题以“德”的观念为核心,由于“德”乃是这一历史时期无所不在的“精神气质”,所以不妨称之为思想史之“德的时代”。“轴心时期”的重要标志则是“哲学突破”,具言之,就是围绕着“道”的概念进行深切而动人的沉思,对“名”予以深刻而彻底的理论性反思,在天人之际的视野以及身心交互的复杂作用下展开的对人性问题的洞见等等,所以“哲学突

破”又可以称为“道的突破”。实际上,这两个时期的思想遗产乃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

轴心时期(含前轴心时期)的文化路径与思想遗产仿佛历史的河床,制约着流水的曲折走向。换言之,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规律在于:它往往通过回溯早期思想文化的渊源而汲取进一步发展动力,也就是说,它往往在某种历史的张力找到创造新文化的源泉活水。可见,“轴心时期”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古代中国文化及其现代意义尤为重要,因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就是总是怀着某种乡愁的冲动返回自身的历史深处重新激活创造的活力。这种回溯性、继承性很强的文化传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古代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仍是一种未曾断裂的、仍然活的传统,或者说是“活的传统”“生成的传统”。可见,中国文化史的基本规律表明,历史与现实并互作用莫分彼此,而奠基性的早期文化史尤其重要,同时其现时代的创造性亦值得特别关注。过去有的西方学者误以为中国历史停滞不前,中国文化凝固不变,其症结在于没有深入认识到中国历史文化之内在规律。现在,我们或许应该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回顾与瞻望的恍然交错之间,把握“旧邦新命”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深刻命题。

轴心时期之所以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也是经典化的时代,换言之,思想文化经典亦创造于这一时期。可以说,经典传统乃轴心时期突破的重要结果。章太炎曾指出,中国文化思想之核心经典几乎皆出于秦汉以前时期,可谓一字一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通过著述、讲习和传承而绵延不绝的“经典之学”,不仅酝酿了强韧的“思想传统”,亦孕育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例如,“五经六艺”,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重要渊藪的经典化过程也是在西周春秋时期启动的,这难道仅仅是巧合?汉语记录的历史文献举世无双(梵文次之),这难道纯属偶然?战国秦汉之世,“经典化”更是踵事增华、推陈出新(经典之学早已不限于“五经六艺”了),迄两汉之际,经典化过程已基本完成。倘若找出贯穿“五经六艺”以及诸子百家著述中的思想内容和精神气质的话,它不是别的,正是围绕着“德”“道”诸概念的建构起来的思想世界,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诸

方面内容。冯友兰在其名作《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将中国哲学思想史划分为子学(先秦时期)与经学(两汉以后)两个阶段,试图以此理解并阐明中国思想史上的解释传统。所谓“经学”就是通过传记注疏对经典文本进行解释,并以这种形式阐述思想;当然这种经典解释的模式和思想展开的方式是与古代中国长期绵延的大一统体制相匹配的。

古代中国文化中的优雅传统令人瞩目。而这种优雅传统不正是通过《诗经》《楚辞》、汉赋、屈陶李杜的不朽篇章呈现出来的吗?不是通过五经六艺、孔孟老庄展现出来的吗?“经典之学”使得人们可以与古哲进行思想交流和心灵对话,赋予人们现实性和历史感。传世经典亦通过不断被阅读、被阐释而焕发了新的活力。这种强有力的经典文化传统卓尔不群,岂能小觑?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只有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发展出了高度的古文明,只有古希腊(含古罗马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古中国和古印度经历了轴心时期的洗礼发展出了经典文化。“经典之学”或经典传统乃一个文化体系的魂魄。倘若一种文化没有发展出或者不具有经典传统,那么当它遭遇到其他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时,往往会有失魂落魄之虞。试想,辽阔的非洲大陆和丰饶的美洲大陆能抵挡基督教文化的强势冲击,而保护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吗?

“经典文本”和“经典之学”并非凝固不变,而是通过创造性阐释而回应时代命题,使过去与现在彼此交融。这不正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之一吗?

以上讨论可以说是寻求解答“旧邦”何以能够“新命”的钥匙,因为轴心时期和经典传统可以部分解释了“旧邦新命”的历史张力。下面拟进一步讨论几个问题,例如政治理念与精神气质、民族凝聚和文化认同、反本开新与旧邦新命诸问题。

二、政治理念与精神气质

中国早期文化的显然而重要的特点就是以政治控驭为中心的原则。轴心时代酝酿形成的独特“精神气质”曾集中体现为政治理念,而伦理美德亦不能不诉

诸政治美德,或者说伦理意义上的美德观念是通过政治上的合理行动原则确立起来的。陈来说:“早期文献中肯定的德及具体德目,大都体现于政治领域,或者说,早期的‘德’大都与政治道德有关。……中国文化早期价值理性的建立,首先是通过三代政治对政治道德的强调而开始实现的,是这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方式在政治文化领域里滋养起一种精神气质(ethos),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这种精神气质首先体现为一种政治理念,即德政意识。周初创设的礼乐制度可以说包含了这种政治理念,其根本特点就是大幅度节制野蛮杀戮和暴力征伐,以某种更合理的柔性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从而使政治原则更趋合理,亦使政治理念濡染了浓厚的人文精神因素,显示出古代中国的政治理念早已摆脱了“丛林法则”的支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大雅·民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万邦,闻于四国。”(《大雅·崧高》)“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大雅·烝民》)《尚书·洪范》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夔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郑玄注曰:“克,能也。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宽猛相济,以成治立功。”可见,“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以及“柔远能迩”“宽猛相济”的政治理念已经确立。孔子所向往的“德政”,孟子所推崇的“仁政”,两汉时期所艳称的“德教”或“礼教”,其实就是这种政治理念的流风余韵。

我们进一步通过若干思想史的片段透视“德政”之于古代社会的意义。西周可以说建构起了较成熟的早期国家,其原因不能不从周人推行的具有德政色彩的政治措施当中去寻找。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空间里布满了称作“邦”“方”“国”的政治组织,它们大多数可以称为“氏族血缘团体。”《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诸书都记载了当时“天下万国”的情形,即便是周初,至少还有八百诸侯。但是,由于周初封建的推行,方国数量迅速减少,这不能不说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周王朝的卓越成功。其中“怀柔远人”应该说是周初政治势力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以来,“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廿五年》)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春秋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精神的主流,而且影响后世极为深远。春秋时期所谓“王道”,就是诉诸“德”而不是单纯的“力”。总之,贬

抑“以力服人”的“霸道”、推崇“以德服人”的“王道”乃西周春秋以来政治语境中的支配性话语。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尧舜的追想,实际上包含了关切“王道”的人文动机,传说中的“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贾谊《新书·修政语上》),汤“德及禽兽”,都反映了这种意识。传世文献中都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例如《诗·长发》《书·禹贡》,郑玄解释说:“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周礼·春官·大司乐》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古称“禹迹”,那么,禹能够扩大中国的政治版图,依赖的正是德的精神气质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从商周墓葬的考古发掘看,西周以后人殉的现象几乎绝迹,这是不是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西周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进步呢?

总之,“以德治国”“怀柔远人”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智慧源远流长。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饮水思源,回到历史深处,汲取进一步创造的动力。因为“德政”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施惠于他者,在秩序与和谐之间找到平衡,从而促进不同来源、不同层面的文化整合以及彼此差异的文明融合,这一点,在“文明冲突论”徜徉于世的今天难道没有意义吗?

春秋战国之交的诸子百家亦热衷讨论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对于时政都有深刻的切肤之痛,同时也意识到如何建构抑或维系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政治社会制度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祉。儒家疾呼“正名”,鼓吹德政和仁政,宣扬诗教和礼教,出于对礼崩乐坏的忧思,对刑罚暴政的抵制;道家无为政治哲学的重要洞见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设施都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如果要从人性异化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摆脱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宰制,不屈不挠的反思与批判必不可少;墨家建言尚贤尚同、兼爱非攻以及天志明鬼,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下层民众或草根阶级;法家推崇法治,要求“一断于法”,最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设施的转型,可谓“古代的现代化”;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也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发生历史影响的;名家比较抽象的名辩,往往也是为了阐发“古之明王”之道的。可见诸子百家特别关注政治问题,秦汉时期的黄老和儒家经学甚至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意味,影响至为深远。这种强烈关注于政治的思想取向既然体现了中国文化以政治控驭为中心的特点,又反映了某

种精神气质,即强烈关注现实生活与政治的精神气质。因为大多数古代哲人都不愿意把出世和沉湎于俗世当作自己的生活最终目标,所以都试图协调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寻求理想性的政治期望与现实的生存困境之间的均衡感。这种均衡感酝酿了中庸、中和以及守中的精神气质。比如说,儒家学者既讲究坚持原则,又没有忘记强调展现灵活性,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经”与“权”之间找到平衡,达成和谐。

近代以来,批判和否弃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思潮席卷天下,与西方思想的传播和接受互为表里,其目的仍在救亡图存,寻求重建中国文明的途径。问题在于,舶来的西方思想学说能不能救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能不能救中国?事实表明,重建中国文明的道路艰难曲折,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如果不能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历史现实有机结合,并予以创造性转化,那就仅仅是空论而已!既然传统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东西是我们必须面向的社会实在,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不回到历史的深处,以复古为解放,开掘新的源头活水呢?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和治国经验,正如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梳理和剖析的那样,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更有许多值得借鉴和继承的地方。可见,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重新找到均衡感,超然于激进与保守之上,回归真正的守中和执中之道。这一点,从一个长时段的角度看,仍是一个有待于完成的探寻。

三、族群凝聚与文化认同

古代思想世界中很少有孤立于社会或族群的个人。这一点反映在古代哲学所讨论的群己关系中。孟子把那些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称之为“野人”,实际上从文化和文明角度不承认其为人,因为在儒家看来,人的社会文化属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庄子也同样否定了孤立的个人概念,虽然他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因为庄子以为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宇宙间其他个体密不可分。庄子所说的“化”不仅仅是郭象所理解的“独化”(孤立个体),同时也是“物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可见,古代哲人认为,每个人都是从祖祖宗